

辛亥前后的熊希龄与日本的关系

陶 德 民

Xiong Xiling's Relations with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TAO Demin

Xiong Xiling (1869-1937) was a key person in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Japan.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he visited Japan for several times for learning management in business and irrigation projects and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is open-mindedness in political reform and his talent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were highly evaluated by Naitō Konan (1866-1934), a leading Chinese history professor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he was the Finance Minister in the first cabinet under the Provisional President Sun Yat-sen and was entrusted by President Yuan Shi-kai to form a cabinet in late 1913. Along with the Justice Minister Liang Qi-chao and the Business Minister Zhang Jian, Xiong started a serial of reform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legal and business systems. They also tried to attract invest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or developing oil field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for curing the flooding problem of the Huai River by a radical irrigation project. However, these Sino-American provisional agreement and contract were taken as the sign of Xiong's intention to curb the Japanese business expansion by Naitō Konan as well as Yamaza Enjirō, the Japanese Minister in Peking, because of the rivalr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Russo-Japanese War. But Xiong denied the charge by Yamaza and emphasized his omnidirectional foreign policy.

清末的改革派（包括体制内的张之洞¹⁾、刘坤一和张謇²⁾等，以及因百日维新失败而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³⁾等）和革命派（孙文、黄兴和章炳麟等）均鼓吹效仿明治维新，其中不少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验，视察日本的经验，或是流亡日本的经验。若不论其「亲日」程度如何及是否有过从「仇日」到「亲日」的转变过程，而给其以一个较为中性的总称，也许可以命之为「知日派」，因为他们都对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的日本在军事、法制、产业和教育方面的近代化成绩有一个正面的认知，故承认有必要师从东洋。关于当时在部分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化倾向，曾有以下一段趣闻。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不久，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清国的新学与革命党」（7月21日，22日连载）的社论，其中提到「世传西太后尝谓某大臣曰，何以学生一往东洋，则变换心肠也。某大臣答曰，叛逆各地皆有，如彼会匪，何尝往东洋耶。今之留学生中颇有杰才，将来益于国家者亦大矣。某大臣之言得当。而在我邦之清国学生及任其教育者，最宜三复太后之言而有所反省。」

显而易见，留学与革命并无必然联系。虽然留学先进国家以引进新学，最终是会导致本国的某种变革的，但变革是否采取暴力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形式，是否造成政权交替乃至国体变更的后果，则是取决于国内外许许多多的复杂条件的。而就一般情形而言，留学人员带来的建设性影响是主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讨论留学人员和辛亥革命这个历史议题时，不应该采取一种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以为辛亥革命必然发生，而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即有多种选择可能性的复杂局势中去细心观察有关人物思想变化的真实轨迹和特点，以为今日之借鉴。

本文的考察对象熊希龄在清末屡次访日，是一个在百日维新中和辛亥革命后都曾一度涉入政治漩涡，而后虽被边缘化，然始终不失其警世和益世作用的重要人物。考察的重点，是其与日本朝野人士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师从不忘自重」的精神。

（一）清末民初的知日派与「财政通」

熊希龄（1869-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4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在开办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理）、湘报和南学会过程中与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打得火热，结果在戊戌政变后遭到永久罢免官职的处分。政变时「六君子」在京伏诛，他则因病未及上

1)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是鼓吹学习日本和推动留日运动最有力的两个封疆大吏。见拙文「西村天因と張之洞の『勸学篇』」，大阪大学『懷徳』第60号（1991年12月）；「西村天因と劉坤一—清末の教育改革をめぐる—」，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18号（1997年3月）。

2) 张謇，字季直，江苏省通州人。1903年春赴大阪视察日本的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见拙文「張謇と内藤湖南及西村天因—内藤文庫所蔵未刊書信考証（一）」，『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第25号（2004年3月）。

3) 梁启超于1898年秋潜逃日本，流亡达14年之久。内藤湖南曾在『万朝报』的时评中对其「戊戌政变记」大加赞赏。

京而得以逃过大难。后来他曾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病，则将与六君子一同就义而成为「七贤」之一。1904年秋为了考察实业，初访日本。其才能得到先后担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和端方的赏识，1905年底作为二等参赞随五大臣宪政考察团出访，于次年5月来到日本，约请杨度代笔撰写考察报告。同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诏书后，11月为视察水利工程而又一次访日的熊希龄与梁启超就组织立宪政党一事进行磋商。因其理财有方而先后出任奉天和江苏的农工商总局总办。1909年4月以后，更被委以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等要职。他屡次上书，就挽救东三省危局，改定地方官制和加强兵备等国家大事提出意见。有关调解防营与新军的矛盾、新军中北洋派与湖北派的矛盾，并防范革命者在新军中开展活动的建议，和援引唐代藩镇四分五裂之惨祸和明末兵事之祸而发出「师之不和，国之大忌也」的警告，尤为切中要害⁴⁾。可以想见，若清廷重视其建议，善用人才，防患于未然，且妥善处理四川保路运动等重要事件，武昌起义未必发生，即使发生，也未必立即形成连锁反应，造成各地纷纷倒戈的局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给夫人朱其慧的信中表达了为清朝一死的决心：「故事变以来，此心确有把握，非敢言忠君爱国也。夫大夫死于事，中外之理同也」。然而他一度赴京探听消息时，眼见「亲贵首先提取大清银行存款，市面因而动摇；王公眷属，迁入六国饭店（位于东交民巷），人心又因而恐慌」，终于意识到清廷大势已去，已不足依靠，也无药可救，进入11月后，他才开始向恩重如山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再三建议采取变通方法进取，以便为国家而非为大清保全关外领土。终不见采用，这才离开奉天，南下上海。他游说于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反对策动南北分立的计谋，维护国家统一，于1912年1月14日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名义领衔致电袁世凯请促清帝退位⁵⁾。

在加入章炳麟、张謇等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在政界的重组过程中，又与张謇和返国后的梁启超一起成为进步党的要员，并成为唐绍仪内阁的财政总长，与列国银行团进行借款交涉。1913年9月熊希龄组成有四位进步党名人参与的内阁，即他本人（总理兼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张謇农商总长及汪大燮教育总长，故有「第一流人才内阁」之称。与梁制定名为「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的改革纲要，试图建立责任内阁和法治国家。当时，日本朝野一直密切关注着袁世凯和熊内阁的动静。例如，大阪朝日新闻1913年11月7日的社论「北京的政变」批评道，「不可不说不说在共和国大总统袁氏的眼中，简直是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议员，没有民论」。该报11月17日的社论「熊内阁辞职说」则指出，「熊被视为支那少壮政治家中的财政通。（中略）救济支那的财政困境，即使举国一致犹非易事，好不容易让熊希龄氏这样的财政通居于内阁总理职位，其地

4) 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71-117页、252-260页。

5) 同上，265-273页。

位却不甚稳固，又屡次传出辞职之说。对此，吾等不得不为支那悲哀」。由此可见，日本舆论对受制于袁世凯的脆弱的熊内阁是表示同情的。

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出身、比熊希龄年长三岁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也不例外，他在清末就与熊有过交往，十分佩服熊的财政知识和手腕。1912年他在奉天做调查时，就有为熊进言的想法，在与当地人士所作的笔谈中写下「贵国此日形势岌岌，弟与财政总长熊秉三交态甚密，欲一为言之。但此时公事甚忙，未能赴燕（京）见伊耳」等句。1913年秋，熊已贵为总理，他更想借其力量来实现自己所绘制的中国改造蓝图。他在『支那论』绪言中有如下一节：「支那的时局宛如走马灯，正在急转变化中。（中略）目下居于权势中心的袁世凯也没有一贯的政策，（中略）虽然内阁总理熊希龄等可谓其中具有一贯政策的人物，其一贯的政策能否获得贯彻，实为目下的疑问。不仅如此，熊希龄的政策实际上似乎是要将在清朝末年所思虑者原封不动地试用于革命之后的今日。我跟熊氏颇有交情，在十年前就当时中国的救亡策交换过一些意见，对其见识是赞赏的」⁶⁾。在『支那论』一书中，「熊希龄」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初版的卷首，内藤还把熊希龄的墨迹与他所尊敬的顾炎武、黄宗羲、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冯桂芬等经学家的墨迹一并加以刊载（『内藤湖南全集』所含『支那论』则未加收录）。

内藤之所以重视财政，是因为他在更早时期担任《台湾日报》记者时了解到，日本在赢得甲午战争、占领台湾两年后，才从逃到福建的清朝官吏处得到全岛的收支概算表，以此为一大教训。所以，在日俄战争中奉天会战结束、对马海战爆发的1905年5月，内藤便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满州财政观」一文。次月，他自告奋勇担任外务省嘱托，赴日本满州军的占领地区调查民政及财政达半年之久，并据此拟定意见书，为在北京与清政府谈判东三省善后事宜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出谋画策⁷⁾。内藤对中国财政史和清末民初的财政所抱有的强烈兴趣，不仅见诸于其关于台湾和满州财政的评论，也可由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中收藏的题为「中国财政史编纂纲领」的亲笔草稿得到证明。他在该草稿中指出，「文明的变移」、「世运的升降及国势的消长，必定与财政的丰歉大有关系」。内藤自己重视财政，又把熊希龄看成「其所长在于财政」的人，所以与熊有意气相投之处。

6) 「绪言」『支那论』（文会堂书店，1914年3月27日初版），1-2页。

7) 陶徳民「内藤湖南の奉天調査における学術と政治—内藤文庫に残る1905年筆談記録について」，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1号，2006年3月。陶徳民「張謇見到的一九〇三年大阪博覧会与日本名士—『癸卯東遊日記』的思想遗产」，陶徳民・朱荫贵・马学新・木村昌人編著『世博会与东亚的参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二) 在引进外资问题上坚持主权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内藤作为一位关注日本对华政策的言论界领袖，确实怀有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帝国意识」。熊希龄组阁后不久，内藤便在「革命的第二争乱」（收入『支那论』的附录之中）中发表了以下意见：「要是衡量今日列国在华的实际势力，日俄两国显然有实力支配支那的命运。此外可以说，英国显然在贸易方面对支那的内政有发言权。（中略）这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出于一己利益而非曰保全支那不可的立场是不相同的。（中略）支那若不能保全，自己（日本）是有最大的权利，（中略）也是有保证分得其中一份的实力和发言权的。」⁸⁾可见内藤是如何认识民国初年列强在华力量对比的。若不了解他的这种认识，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支那论』中，他一方面依据近代国民国家的逻辑和近世中国经世论的传统来认真建言，以支持熊希龄整顿国家的努力，一方面却按照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的逻辑来批判他的「联美制日」策略，甚至建议为了轻减财政负担，中国不妨放弃国防和塞外领土。其实，这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内在矛盾和本质。

在『支那论』出版前夕的3月12日写下的「自叙」中，有下一节感情用事的文字：「（中国政府）日复一日要将其国运投入无底之黑坑。前此的五国借款，尚是考虑到本国财政权独立的借款，而近日为油田及淮河疏浚而引入外资等，是近乎否定了自己存立的借款。（中略）虽然我自己完全是代支那人、为支那着想才撰写此书的，但是以今日这样的状态，可能不久就再也没有必要为支那打算了。北清事变（指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之役）时，在天津临时成立了都统衙门，实行列国的联合政治。我估计，第二次大型都统政治出现的时机应该不会很远了。（中略）实行都统政治的话，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以及领土问题都是不必要的了，因此本书只有第三章以下尚有值得考究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对熊希龄等民国初期的政治家其实是抱有一种「监护人」意识。他对采取日本模式的清末改革事业的一贯支持，对民国初年的财政破产状况的悉数掌握，以及上述的帝国意识，都是促使这种意识形成的原因。

文中所说的「为油田开发及淮河浚淤而引入外资」，是指两项美国贷款。第一项是由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与代表美国红十字会的美国驻华公使于1914年1月13日签订的淮河治理工程贷款意向书，总额2,000万美元，年息5厘。第二项是于同年2月10日由农商总长张謇与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达成的有关在陕西省延长和热河省建昌开发油田的贷款合同，总额达3,500万美元。辞职前夕的熊希龄总理也出席了第二项合同的签约仪式；挂冠之后则出任了全国煤油矿产事宜督办。

8) 同注(6)，395-396页。

关于这二项合同，当时日本有如下报道。首先，以「美国在支那的新地盘—淮河流域的治水开垦事业—」为标题的头条报道（『大阪每日新闻』1914年2月2日）指出，治淮贷款是以「防洪成功地区的地租中得到的余款、新开垦地区的地税以及该地域（淮河流域）内的大运河交通税」作为担保的贷款，「此大事业告成之晓，支那不仅可以从连年的惨事中摆脱，而且可以获得广大的良田和住宅地。支那有此利益，值得为之庆贺。不过至今没有任何在华地盘的美国，不仅可以在支那的中腹地区获得地盘，而且插足英德势力范围的中间，在一直不许他国进入的地域得到广大的立脚地，是最可注目的一大事实」。其次，以「油坑采掘契约」为标题的「北京特电」（『大阪每日新闻』1914年2月14日）指出，美孚石油公司「不是以提供现金获得专卖权的，而是约定公司首先派遣技师赴华北和陕西探检石油坑，在确定哪些石油坑有充分的价值后才组织新的中美石油公司，其股份由两国对分，中国方面由政府及民间投资者持股，美孚公司则可掌握新公司的管理权」。根据这些报道，这两项贷款显然并非如内藤所指摘的那样，是「近乎否定自己存立的借款」。章开沅先生在近年的研究中也指出，农商总长任上的张謇是以不损害民族权益为前提来积极引进外资的⁹⁾。

在此尤须注意的是，内藤的判断是在对比这两项美国贷款和「善后大借款」（即中国政府以盐和海关关税作为担保，由美国以外的英、法、德、日、俄等五国共同参与的贷款）之后作出的。因为对于当时缺乏对外投资资金的日本来说，参与这种与各国协调并均沾利益的政治贷款是最有利的。而如果对华经济贷款实行自由化，日本就很难成为西方列强的对手¹⁰⁾。若将上述两项美国民间集资贷款与到当时为止的日本官方或民间的对华个别借款比较的话，每一项都是在数额上大大超过日本的款项，而且当时美孚石油公司的销售网在中国和日本两国均在持续扩充¹¹⁾。因此，内藤的所谓「近乎否定自己存立的借款」，实际上是指责中国方面自主缔结契约的行为，而并非指所缔结契约中的担保条件。换言之，即中国在没有事先咨询日本意见的情况下先行跟美国结成了巨额贷款合约和意向书，且给予美国以位于「支那中腹」及中枢地区的地盘，从而破坏了列强在华的势力平衡，并可能会变成引发新的利权竞争的火种¹²⁾，这是在中国事务上拥有最大的「权利」、「实

9) 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282-285页。

10) 平智之「第一次大战以前的对中国借款与投资主体」，收入『日本的资本输出—对中国借款的研究—』（多贺出版，1986年）。副岛圆照「善后借款的成立」，收入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的研究』（筑摩书房，1988年）。

11) 直至1914年4月，美孚石油在华销售总额已经达到100万美元。许滌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774页。「内外油激战期逼近」，『大阪每日新闻』1914年2月20日第5版报道。

12) 当时日本在利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可由上述『大阪每日新闻』1914年2月2日的头条新闻之后的一则报道得知。题为「成贵铁道与四国团」的该报道对于成都·重庆·贵州之间的铁道敷设权给了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一事表示强烈关注，指出「不能染指中国本部的日本帝国对此形势不能不警醒奋发」。

力」和「发言权」的日本所决不能容许的背信弃义行为。

这样的见解在当时决非少数日本人的意见，可由以下事实证明。即在『支那论』「自叙」写成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拜访了熊希龄，以「殊与各国条约利益有碍」和「似有不顾邦交之意」为理由，指责中国优先给予美国以油田开采权。对此，熊希龄则反驳说，合约乃「是根据前清政府商订之意」，并且强调「盖应许何国商人合办矿产，乃我国主权之自由」¹³⁾。其实，早在1910年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前后，张謇和熊希龄等已经开始努力引进美国等国的资本，以牵制日俄两国、特别是日本在东三省的独占性势力扩张¹⁴⁾。当时担任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的熊希龄苦心维持国家主权，建议为修建锦瑗铁道引入巨额美国资本，以求实现东三省中立化¹⁵⁾。内藤是否了解张謇和熊希龄在这两份合约背后的这种意向，不得而知。他的所谓「近乎否定自己存立的借款」，显然是对中方背离日方的警告和指责。依据上述内藤的「国际认识」，所谓最近的将来也许会出现的「第二次大型都统政治」，当然是由日俄两国或者日俄英三国主导的列国共同统治。换言之，内藤批判中国政府引入美国资本一事，可以视为其对日美在华竞争（为在「中国本部」取得势力范围）的过度反应。事实上，如前所述，武昌起义后，内藤认为如能抓住塞外领土变动的机会，把列强势力范围分割的问题加以「巧妙解决的话，东亚和平便可永久持续，动辄议论纷纷的日美战争，亦可绝对防止」，可见内藤早已意识到日俄战争后愈演愈烈的日美对立。因而他针对这两项中美借款合同及意向书严叱中国「引狼入室」，是一点也不奇怪的¹⁶⁾。

(三) 结 语

1918年8月11日，熊希龄在答覆其熟知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请求其出面调停南北对立时，作了如下具有历史眼光的论述。「敝国各种乱源，酝酿已非一日。则今日亦非短促之时期所能挽救。前此辛亥革命，侥幸成功，旧势力依然存在，不能不以袁氏为中心，冀循政治之轨道，以收统一之效果。袁氏不德，自取灭亡，所遗於民国者，皆其恶孽败种，以致今日群雄纷扰，不可收拾。然以敝国旧历史沿革推之，凡属鼎革之秋，无论何种旧势力，均以互相残杀，淘汰净尽，而后有一特殊之新势力逐渐发生，遂成统一国家之功，以昔较今，此例殆不能免也。」¹⁷⁾由此可见，他把

13) 「三月十二日日本山座公使关于美孚合同之谈话」，『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4965-4967页。

14) 同注（9），215-224页，288-289页。

15) 「为挽救东三省危局上载译书」，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223-225页。

16) 参见拙文「内藤湖南における『支那論』の成立—民国初期の熊希龄内閣との関連について—」、『東方学』第108輯、2004年7月。其中文版发表于『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2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题为「試論辛亥革命後内藤湖南の中國觀—『支那論』の成書過程与熊希龄内閣の關係—」。

17) 「復犬養毅函」，同注（13），4541页。

自己身处的时代看作类似汉唐之间的南北朝和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那样的时代，是需要经过数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由大乱到大治的过渡时期。同时，他也对犬养的外交公开的想法表示赞同，即积极促进日中亲善，但要有易于引起「欧美列強之猜疑」的秘密外交举动。

此后，他发起成立并在许多民间团体担任了重要职务，较为著名者有香山慈幼院，和平期成会，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红十字会等。他虽然淡出政治，仍不忘国计民生和世界和平，可谓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一位贤哲，其「师从不忘自重」的精神尤其值得赞赏¹⁸⁾。

18) 关于本文的主要观点和视野，参见拙著『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因・湖南の外交論策—』（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